

文心雕龍這本書

文論及其時代

邵耀成 著

金

題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文心雕龍注本書

陸機文心雕龍注

卷之三

陸機文心雕龍注

陸機文心雕龍注

文心雕龍這本書

文论及其时代

邵耀成 著

金鑑堯 題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心雕龙》这本书：文论及其时代/邵耀成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7

ISBN 978 - 7 - 5161 - 4371 - 1

I. ①文… II. ①邵… III. ①中国文学—古典文学—文学理论—南北朝时代②《文心雕龙》—研究 IV. ①I206.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26201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 鹏
责任校对 吕韩强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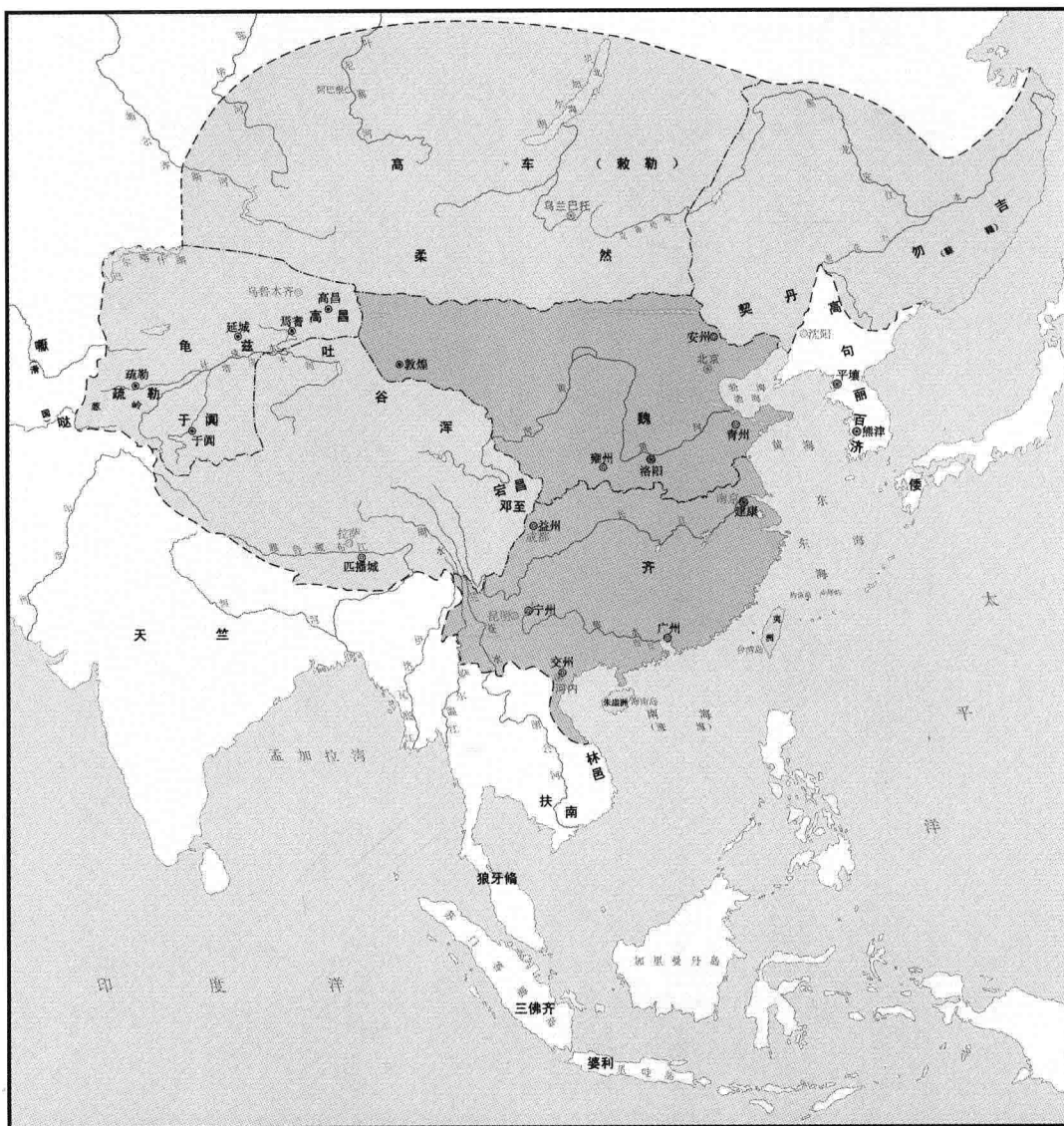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6.5
字 数 435 千字
定 价 7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五世纪中期中国形势及周边民族分布示意图（黄玉成绘制）

图上界线参考《中国历史地图集》齐建武四年、魏太和二十一年（497年）的界线绘制。

文学评论

耀成先生著席：玄秋
由馮君其庸轉來，今作
上無尊，富地比，遂來
能通函。今日由陳名毓
照錄交一章，并附惠
書，其感不遺在在之意。
第四章為多，暇披尋，先
此道河，以慰懸想。浮沉。

钱锺书先生与本书作者早年的通信

第二十三章前曾稍诵，其
研精思微，谓偶於出籍
词意求之，遇你 *Quam* 常戒
学者 *"Nolite docement de textes"*
都见 *六* 谓 *此* 乃 *一* 函 *二* 言
不敢强欲人同。君中掉臂
独行，为 *必* 理 *老* 生 *常*
谈也。由彼印同
此子。
钱锺书

前言

《文心雕龙》无疑是中国文学批评传统中的一部“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划时代著作。作为一个现代人，我们应该怎样去了解它呢？自然，我们不能放弃传统注经译经的基本功夫，因为如果对文义了解得不清楚，再高深严谨的现代理论也是在空中构建的楼阁，那是风一吹就会倒塌的理论架构。但是，我们若只停留在注经译经传统考证的层面上，就会把自己圈禁于一个牛耕的农业社会之中——那个尚未与现代科学接触的年代里。因此，我们必须尝试，以现代理论和分析的方法来解读古籍，即便失败也要尝试，把受到现代科学影响的人文研究方法带进“龙学”（《文心雕龙》的学术研究）之中，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失败中建立起成功的基础。所以，我们不期待成功，我们只期待一个能够指向成功的失败，一个能为未来成功打下基础的失败，这是本书的目标。

一 内容

刘勰（465？—537？）虽然打着“徵圣、宗经”的旗帜，但他的《文心雕龙》中的三个篇章，《原道》、《辨骚》、《神思》，却完全颠覆了儒家“言志、教化、讽喻”的价值观。他所依据作为文或章的本源的道，不是儒家的“人道”，而是道家的“自然之道”（《原道》）以及《易》的天、地、人“三才”之道，人因天地而生，但因为是万物之灵，因此与天地并生而鼎足为三；人和天地最大的不同乃是天地无心，而人则有心，因此，人为“天地之心”（在《原道》中出现二次）。孔子（前551—前479）、孟子（前372—前289）、荀子（约前313—前238）都没有谈及过自然之道，它显然是和荀子以后的儒家是拉不上关系的。《论语》、《孟

子》、《荀子》也没有“三才”的记载，“三才”显然和儒学之前的孔学也是拉不上关系的。因此，《文心雕龙》第二章的《徵圣》和第三章的《宗经》与开章明义的《原道》是泾渭不同的两个思想架构。刘大杰和刘若愚两位先生把《原道》和《徵圣》、《宗经》分开，强调《原道》之道，乃自然之道^①；刘若愚先生进而把刘勰的文论解读为形而上的文学理论^②，与众多评论家把刘勰的道解作是韩愈之儒道^③相比，是更能令人信服的。在外观上，也就是在表面的言论上，刘勰确有述说——并坚持——儒家文论的价值观，那是他从小被灌输的观念^④；但在内心深处，在对文学的本质经过潜心默想之后，他认识到文艺创造的本质种根在形而上的道（万物创造的原生力）中，他因此在第一时间说明他的立场。如果借用一句常常用来形容这两千年来中国政治体制的话，所谓“阳法阴儒”，那么，刘勰的文论可以用“阳儒阴玄”来形容，也就是说，在表面上，充满了儒家传统“文”与“学”的价值观，但骨子里，是道家和《易》的玄学架构，关于后者，在本书中有进一步的说明。

周振甫先生明确地感到，刘勰对《楚辞》的爱慕和评价超过了《诗经》，周先生对《辨骚》作如此的解说：“这种〔《楚辞》文学〕发展可以‘轶古’，是超越古代，‘难与并能’，无可比并，不正是胜过《诗经》吗？这就是《时序》里指出《楚辞》的‘笼罩雅颂’，也是指超过《诗经》。”^⑤这可能是刘勰把《辨骚》放在《明诗》之前的原因。对《楚辞》的偏爱其实是汉朝以来大部分文人的一个共识；他们模仿骚体写赋，而不

① 刘大杰称：“他（刘勰）在《原道》、《序志》二篇中所说的道只是天地自然的法则，与后代的文以载道（韩愈标志语）的一家之道是完全不同的。”见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繁体版），香港古文书局1973年版，第305页。在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发展史》（第205—206页）中不见该讨论。刘若愚先生关于刘勰乃形而上文论说，见James J. Y. Liu, *Chinese Theories of Literature*,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5, pp. 18-36。

② James J. Y. Liu, *Chinese Theories of Literature*, p. 21.

③ James J. Y. Liu, *Chinese Theories of Literature*,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5, pp. 18-36.

④ 《序志》称：“予生七龄，乃梦彩云若锦，则攀而采之。齿在逾立，则尝夜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旦而寤，乃怡然而喜，大哉！圣人之难见哉！乃小子之垂梦欤！（我七岁时〔有一天〕，梦见像锦绣那样的彩云，便攀登去采彩云。三十多岁时，夜梦中，我曾梦见自己提着丹漆的礼器，跟随孔子向南走去。早上醒来，高兴得神采怡然。那真是一件大得不能再大的事啊！圣人可不容易见得到的啊！竟降临在我这个孩子的梦中呢！）”

⑤ 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中华书局2005年重印1986年版，第39页。

模仿《国风》写诗；直到五言诗（那是与《诗经》完全不同的诗体）的出现，创作之风才有所改变。可以这样说，屈原（前340—前278）的创作使人看到文字的艺术性，文学作品的“美”。大家可能会感到笔者这个说法荒唐，《诗经》怎么可能会没有让中国人看到文字上的美呢？但是，在《论语》、《墨子》、《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中，大家不会找到一言半语形容《诗经》文字之美的话。其他哲人且不说，只说说孔子和庄子（约前369—约前286），他俩无疑是对艺术美有极高的体会和认识的。孔子因为对韶乐美的沉醉，好吃肉的他三个月没吃肉；庄子则是中国传统美学的开创者，可能，到今天还没有中国人在这个传统中超越他。这样厉害两个人，怎么可能对文字的美没有体会呢？只能这样说，他们俩可能朦朦胧胧地感觉到文字美的存在，但还未到能明确清楚地说不出的阶段。他们对美的明确体会来自礼乐和礼舞。在本书讨论刘勰的文学史论述时，笔者将进一步探讨：在什么时候中国人明确地认识文字美的存在？为什么《楚辞》比《诗经》更能使人认识文字之美？由此而认识到刘勰革命性文论的创见。这将成为本书第三部分《刘勰的文论》部分的第一章，题为《刘勰关于“纯文学”史的论述》，主要取材自《徵圣》、《宗经》、《正纬》、《辨骚》、《明诗》、《乐府》、《诠赋》。

有一点是需要强调的，刘勰不是一个具有分析性、系统性的理论家——即使在所谓“创作论”的篇章中，例如，在《神思》、《体性》、《风骨》、《通变》、《定势》、《情采》中，“文心”的论说混杂在“雕龙”的论说之中，而且，前者稀少，后者众多，我们必须在“雕龙”的砂石中找寻“文心”的珠玉。关于他从《原道》中玄学的“道”和《易》的“三才”而来的“创作论”，形成了本书的第三部分的第二章，题为《“文心”与“雕龙”两个层次的“神思”创作论》，且主要取材于以上七章。如果我们说一首诗作美，而且是超凡脱俗的美，作为一个评论家，一个很自然的问题是：什么“东西”在这首诗中使它有这种不平凡的美？世界著名男高音帕瓦罗蒂（Pavarotti, 1935—2007）可能会说：因为上帝的一个吻。英国大诗人华兹华斯（Wordsworth, 1770—1850）持相同的见解，认为最伟大的诗章来自上帝在自然景象中的显示。华兹华斯是诗人，不是文学批评家，但他的伙伴柯尔律治（Coleridge, 1772—1834）则两者兼具，优秀杰出，而且提出“创造性的想象力”（creative imagination）理

论，认为一个作家必须用创造性的想象力创作，像神创造世界那样，才会创造出神一样的作品来。从我们对《原道》的解读，两种说法有极相似的地方，笔者将以这个现代观念去解读“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原道·1.1》）的“天地之心”，笔者认为这是刘勰“文心”的本意，是一种有原创性的想象力；缺乏这种力量的构思，那是工匠一样的“雕龙”。这是本书题目“两个层次”的由来：原创性的“文心”是一个层次；工匠般的“雕龙”是另一个层次。

笔者另外还写了一章关于风格的篇章，题为《“文心”与“雕龙”两个层次的风格论》，取材自《文心雕龙》各篇章，有融会贯通本书第三部分第一章、第二章两章和第四章的作用。我们若要以现代化的眼光来审察刘勰的“风格论”，建立起一个称得上现代化的理论架构，那就必须要有一把尺子，可以用它来衡量刘勰在“风格论”方面的观点。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一个理论上严谨的关于风格的定义。可是，我们有没有这么一个定义呢？目前来说，恐怕还没有^①。然而，风格一词已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口头语，大如建筑、小如姿态服饰，都是开口风格这、闭口风格那的。论文学因为定义不明确而不谈风格，就有一点鸵鸟政策的味道。我们且大着胆子，论一下风格，抱着“知之‘谓’知之，不知‘谓’不知”（《2.17》）的态度，对不能界定的领域，作出旁踏一步的认知和说明。在亚伯拉罕（M. H. Abrams）畅销美国大学三四十年的手册《文学术语汇编》中^②，关于风格的概念，他有一个广泛而中肯的定义，我们且以这个定义为起点，进而勾勒出刘勰“风格论”的概念，总结成一个在逻辑上更严格的定义。

刘勰的“雕龙”层次的文论，也就是“文章作法论”，却是精彩无比，深得徐复观先生的欣赏，他认为它的含义和英国论文大家斯宾塞

① 关于什么是风格，20世纪60年代时，讨论较多，目前好像没有，至少在英文语言中是这样；一些关于这方面的论作如下：Bennison Gray, *Style: The Problem and Its Solution*, The Hague: Mouton, 1969. R. A. Sayce, "The Definition of the Term 'Style'," in *Proceedings of the Third Con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sociation*, The Hague, 1962. Seymour Chatman, "On the Theory of Literary Style," in *Linguistics* 27, November, 1966. David Birch and Michael O' Toole, ed., *Functions of Style*, London & N. Y.: Printer, 1988.

② M. H. Abrams (亚伯拉罕), *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57; 3rd ed., 1971.

(Herbert Spencer, 1820—1903) 在某些层次上是不遑多让的。本书第三部分的第四章, 题为《“雕龙”层次的文章作法论与各类文体的论述》, 讨论刘勰的一些文章作法见解在经过 1500 年的时间冲洗后, 还是没有褪色, 可与现代思潮一争上下。本节观点主要取材于从《颂赞第九》到《书记第二十五》的十五个篇章(其中《杂文》、《诸子》两章弃而不论), 以及从《熔裁第三十二》到《附会第四十三》的十二个篇章。文章作法的准则只能应用在特定的文体、特定的场合, 以及特定的说话对象。这一点我们在第三部分第三章讨论风格时已论及, 我们将就《熔裁》、《声律》、《章句》、《丽辞》、《比兴》、《夸饰》、《事类》、《练字》、《通变》、《附会》、《总术》各章(其中《隐秀》一章, 多为后人所补作^①, 弃而不论), 重点地提炼出他的文章作法准则。现代文论学者赫什(E. D. Hirsch, Jr.) 之所以认为他的原理是原理, 乃是因为他给予文章作法准则心理学上的依据^②。不同文化间的差异是巨大的, 但生物性的心理学是普遍性(universal)的。因此, 现代英语的文章作法准则和 1500 年前刘勰时代的文言文的文章作法准则是有共通的地方的, 我们尽量在比较两种文化中的文章作法准则时, 给予心理学上的解读。目前, 这种研究还未成熟, 但应该是一个极具前途的方向。

在印度文化、印度语言学与译佛典巨浪的冲击下,《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在 1500 年前就有着如下的警觉性, 他认识到: 在中国文化的传统中, 我们缺乏文法、音韵与修辞学上分析性的概念, 以及理论思维缺乏系统性的结构。他为此而努力, 想为没有文法观念的中国人下一个文法结构的定义; 为刚刚才认识到自己的语言发音有“四声”的中国人下一个声乐上的理论解释; 为传统“赋比兴”修辞分类下一个精确的定义; 可惜, 从现代的水平来衡量, 他都未能达到他的目的。

笔者为刘勰所承传的语文背景, 写下了附录的头四章: 附录一《文言语这个概念与章句中虚字字符的产生》介绍了中国人在 3500 年前, 因为没法记录自己的口语而发明了文言语, 在章句与虚字发明之后, 才开始

① 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 中华书局 2005 年重印 1986 年版, 第 355 页。

② E. D. Hirsch, Jr., *The Philosophy of Compositi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7, pp. 58, 65-71, 94, 171.

能记录文言语而因此有文言文；附录二《商末周初因记录的需要而创造字符的“形声造字法”》，以想象的方式介绍了“形声造字法”。那时，在原先不到一千字的基础上，先贤们发明了偏旁和声符，从而创造出几千个字来；附录三《不赞成以神话的眼球看中国文学史》，认为《诗经》中几乎没有神话，《楚辞》中虽然有灵界的形容，但那是以礼的程序来形容的，而不是以故事的形式来形容的，因此《文心雕龙》不以神话的眼光看中国的文学史是正确的；附录四《一个梦想：打造从中文句子自然生态而来的文法结构》，论说刘勰有了文法的观念（也就是句子应该有一个结构），但没法把这个结构形容出来，正如近代语法家——例如吕叔湘、王力、高名凯——虽然认识到虚字的特殊性，却没法把它从句子结构上创建一个从中国语文自然生态而来的文法架构。不过，刘勰超乎凡俗的警觉性已把它放在一个“出于其类，拔乎其萃”的档次，成为了一个在文化关键性的问题上存在着先知先觉性的人物。同时，他为自己的理论体系建立了一个形式性与比喻性的、借镜自《易经》的系统。这个系统从现代的眼光来看，不能说是没有缺点的。但在中国传统中，包括任何一位哲学家：孔、孟、老、庄、荀、韩，甚至王弼（226—249），刘勰都是一个独创者。

对《文心雕龙》五十章的分类，笔者和传统的看法略有不同。笔者认为总论（或“文论基本价值观”）应包括《明诗》、《乐府》、《诠赋》三章，因为前5章的题目都是动词名词结构，而《明诗》、《诠赋》也是这种结构，虽然《乐府》是例外，但和《颂赞》两个文体名词“颂”、“赞”比较起来，是断然不同的。一直到第25章《书记》为止，原则上，都是以这个方法命名的。中间有三个例外，它们是《杂文》、《诸子》、《封禅》。从《颂赞》到《书记》十七篇，我们称为“文体论”。从《神思》到《情采》六篇，再加上总论的《原道》篇，我们称为“创作论”（或“文心论”）。从《熔裁》到《附会》十二篇，我们称为“文章作法论”（或“雕龙论”）。从《总术》到《序志》七篇，我们称为“杂篇”，也就是说，刘勰不知道要怎样分类这几篇，就把它放在后尾，更准确一点，是我们不知道要怎样去分类它们，无以名之，名之为杂类。《时序》有文学史的味道，物色介绍了“创作论”中重要的感应观念。可能很多人会不同意笔者称《总术》为“杂篇”，笔者也知道——例如，祖保泉先

生对纪昀不看重该章的批评^①。不过，在笔者自己阅读该篇章的经验里，确实读不出什么意思来，为了对笔者自己诚实，对该篇章弃而不论。其他不论述的篇章还有《杂文》、《诸子》、《隐秀》、《才略》、《知音》诸篇，因此，本书所论述的《文心雕龙》篇章，只有四十四篇。

关于刘勰的生平，我们讨论了他生年有4年的误差期，卒年有6年的误差期，书稿完成的时间可能也有6年误差期。他一生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完成了《文心雕龙》的创作，我们以“燃烧生命的创造”来形容刘勰这段文论的创作生涯，乃是因为我们相信他在出仕之前是把他整个生命都倾注进研究文论问题之中，是一种全心全意地把生命燃烧的崇高精神追求。而不是像目前流行的看法，认为他因为生活上没有依靠，加上僧祐（445—518）是社会上显赫的僧人，将来可以帮助他结识皇族显贵，他才进上定林寺依附后者的。我们完全不能同意这个看法，因为一部像《文心雕龙》那样伟大的作品不是一个不专心的人可以写成功的，如果他在还未写《文心雕龙》之前就满脑子想着仕途与人事关系，那他一定写不出这样一部精神生命凝聚成金的不朽著作。

刘勰进上定林寺，因为那里有书，那里有一个读书的环境，他可以心无旁骛地研究学问，不必为生活担忧；同时，有一位学问渊博的“老板”——僧祐——可以指点他读书，特别是在佛学的学术典籍方面，包括佛家史传和目录学。他绝不可能为未来的仕途而在十多年前就安排谋划自己进身的人脉关系^②。我们且以自身为例子吧！我们大家都投胎进了一个阶级社会之中，从小就被灌输一个人受教育是为了能得到一个更好的职位的观念。因此，大家都想进名校，博士生想找名教授做导师。一个只会的人脉关系转念头的博士生，他的专业论文一定写不好。而我们却以这样的功利心态去看刘勰，那真是有点罪过的。

刘勰就像在工作中的米开朗琪罗（Michelangelo，1475—1564），看到的只有面前的石头与凿子凿下去的线条，其他一概不闻不问，连自己吃什

① 祖保泉：《文心雕龙解说》，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867页。

② 一个说法认为刘勰依僧祐是为了结识丁贵嫔（460—508，昭明太子母亲，梁武帝夫人僧祐名誉性的俗家受戒弟子）。这个说法的荒唐在于：刘勰依僧祐在齐世，根本不可能知道梁武帝会灭齐称王，更不可能知道丁贵嫔会生儿子（刘勰20岁时大约昭明太子还未出世），而且她儿子又会被封为太子。

么，睡什么都不关心。工作有多大，世界就多大，除工作外没有别的世界。孔子就曾经这样说过：“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议也。”（《4.9》）。写武侠小说的古龙（1941？—1985）先生也懂得这个道理^①；在他笔下的剑神“西门吹雪”是一个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剑与剑术的人，他就是剑，剑就是他。当他听闻泥人张后裔的巧手“并不是天生的，而是练出来的”时，书中接着说：“其实那不但要苦练，还得要有一种别人无法了解的狂热与爱好……西门吹雪脸上也不禁露出这种被感动的表情，因为他了解。对于这种感情没有人比他了解得更清楚。他少年时，甚至在洗澡睡觉的时候，手里都抱着他的剑。”那是一种如痴如迷的执着，刘勰对文论的热爱就像西门吹雪对剑的痴迷一样；若果^②我们不了解这种热爱，我们就不会了解他这个人，也没法了解其作品的精神所在。

严格来说，刘勰作为伟人的“巅峰经验”（peak experience）在503—505年间结束，在这段时间里，他转化为一个一般性的名士，争逐于名利场；同时也建功立业，完成了儒家教育的士人责任。但他已不是一个继续创建千古文化事业的伟人；他燃烧生命的创造于此结束。因此，笔者原本打算把505年作为其时代年表的终结年，但由于笔者想把梁武帝的部分生涯放进笔者的时代年表中加以分析，因此，笔者把终结年放在520年，比刘勰卒年早12—17年。

本书第二部分第三章《南朝和北朝465—520年间的时代年表》的着重点在于讲述得清楚明白，即使是普通读者也能一看就明白，很多专家们认为平凡的专有名词，例如：“三老五更”、“耕藉田礼”、“常平仓”、“监福曹”、“僧祇粟”、“寺户制”、“佛图户”、“总明观”等，笔者都加以解释。对寺庙职称，例如：维那（梵文 Karma-dāna，音译“羯磨陀那”，意译“授事”）和上座（梵文 sthavira，巴文 thera，藏文 gnas-brtan）等，也予以注释。凡年表中所引的僧人例如昙摩伽陀耶舍（梵文 Dharmagatayaśas），以及佛典例如《十诵律》（梵文 Sarvāstivādinaya，59卷，《大正藏》第23册律部），尽量介绍说明。传统年表对一些家喻户晓的名言，不注出处；笔者的另一个工作乃是为这些引文找出处。

① 古龙：《陆小凤传奇之二：决战前后》，华新出版社1977年版。

② 中国南方方言，如果的意思。

大家一般都会说，南北朝政治动荡，战争频繁，社会不安，经济不稳。那么，到底有几场战争？谁跟谁打？有多少朝廷中或地方上的叛乱？有多少民间的起义？有多少僧人的起义？有多少少数民族部落的起义？从本书中的时代年表，笔者做了九个列表（附录六一十四）帮助解答这些问题。大家会发现，除了和北朝有过七十五场战役之外，南朝从未和境外任何其他国家打过仗，而北朝则和二十一个少数民族部落政权打过十九次仗。在邦交方面，除了与北朝之外，南朝还与十九个境外国家有友好的关系。外交往来，乃表示两国是友邦，两国民众可以互相来往做生意。跟随在使节后面的，就是商旅生意人。

南北朝其中一个最大的差异是在地方官或宗族起兵造反或谋乱的频率上，从附录八《南朝与北朝 465—520 年间地方官或宗族起兵造反或谋乱》来看，这个列表显示出地方官或宗族起兵造反或谋乱一面倒地发生在南朝，共三十二宗；北朝仅有两宗。后者比起有七王之乱的汉朝来，成绩更好。我们一般都喜欢说，南北朝政治不安定，这是不正确的，至少在我们研究的 55 年期间，是不正确的。应说南朝如此，平均每两年有一宗造反或谋乱，而北朝在官僚统治上是相对稳定的。这自然反映了南朝在 55 年间，共换了两个朝代，共更替三个统治政权，而北朝只有一个统治政权。

附录中的十五个列表，有一个不是笔者自己编写的，而是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张南南先生编写的，那就是附录五《南朝和北朝 465—520 年间的佛经译作》。笔者原本以为有了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佛教史》，以及赖永海先生主编的《中国佛教通史》^①，就能轻松地编制一个佛典译作表，把 465—520 年间有哪些译作，是谁译的，在哪一年或哪个时段译的，在哪里译的，以及相应的梵文都著述清楚。结果，笔者认识到专业训练的重要性，得到张先生的帮助，才有附录五这个表。由于史书并没有明确地说，沈约和刘勰等受到译经活动的影响，因此，我们必须列举出译经活动的广泛性与无处不在的事实来证明他们必定会受到影响。

^① 赖永海主编：《中国佛教通史》（全 13 卷），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

二 体例

笔者尽量注明每一个人物的年份或年代，包括传奇人物；按惯例，只在人物第一次出现时这样做；但也有例外。年份的格式为某人（前500—前429），若在公元前100年内，则在后一个年份加“前或后”以示公元前或公元后，例如某人（前71—前4）或某人（前71—后4），前者死于公元前4年，后者则死于公元后4年。地名亦然，在第一次出现时说明乃近代何处。以谭其骧先生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为根据。

《参考书目》一章的体例请看该篇章前言，在注解中，第一次引用，则附全书资料，同页再引时，只提供作者与书名，引古籍时，则按常例提供书名与篇章名，例如《礼记·檀弓下》。有两个书目或篇章例外，《论语》只以篇号、章号来代表，例如：《10.3》乃《乡党》第十部分之第三章，《道德经》只以《63》代表第63章。另外笔者用[]方括号表示补上缺失的句词，以便阅读，用（）表示说明。

三 鸣谢

本书改写自笔者讨论刘勰文论的博士论文，第三部分第二章的“创作论”基本上没有什么改动，第三部分第三章“风格论”和第三部分第四章“文章作法论”则扩充了一倍有余，第一章“纯文学史”则为新作。第二部分的《刘勰生平年表》、《南朝和北朝465—520年间的时代年表》，以及附录15篇全为新作。在2006年，笔者基本上改写好这本书，准备出版，北京一场孔子热把笔者卷进孔子研究的行列中，一跳进去，就是五六年，2012年12月重整稿件，了结了一个长达30年的夙愿。

虽然年代久远，我还是得谢谢我的论文导师：刘若愚先生、王靖宇先生、杜维明先生，以及肯尼斯·菲斯（Kenneth Fields）先生。

熊婕女士、熊海静女士、汤群凤女士帮我在网上查找资料与核对，特此致谢。再一次谢谢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张南南先生替我编制附录五《南朝和北朝465—520年间的佛经译作》。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冯广裕先生、王磊先生、郭鹏先生，在出版方